

◎张灏 著

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

——谭嗣同思想的分析

谭嗣同是近代历史上一位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家。他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只不过三四年的时间，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却留下了光彩的事迹和深远的影响。这本小书，不是谭嗣同的传记，而是透过他的一生行迹和他的作品，勾画出他的思想发展，展示了他的心路历程。本书分述了谭嗣同的性格、身世与环境、心路历程及仁学思想体系，为当代一重要学术创获，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

——谭嗣同思想的分析

张灏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04-13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 / 张灏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

ISBN 7-5633-4969-3

(思想史研究小丛书)

I. 烈… II. 张… III. 谭嗣同 (1865~1898) —
人物研究 IV. B2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297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3.5 字数：71 千字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册 定价：12.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原版前言

这本小书是我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一书英文本的副产品。在那本书里，我讨论了谭嗣同的思想，可是由于主题和篇幅的限制，未能对谭嗣同的思想作一全面的分析，因此有这本小书的尝试。

此书问世之时，正值外婆逝世三十周年纪念。谨以此书献给她老人家在天之灵。

张灏
1987年初夏

目 次

原版前言

一、序论	4
二、性格、身世与环境	20
三、心路历程之一——宗教心灵的涌现	37
四、心路历程之二——影响和变化	44
五、心路历程之三——由保守到激进	56
六、谭嗣同的仁学	87
七、结论	94
参考书目	95

一、序论

谭嗣同在中国近代史上不能算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但却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他的一生总共只有三十三年,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也不过三四年的时间,然而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却留下了光彩的事迹、感人的身世和深远的影响。这一本小书,不是谭嗣同的传记,而是希望透过他的一生行迹和他的作品,勾画出他的主要思想发展,他的“心路历程”。

谭嗣同的心路历程,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遍性,因此,透过他的心路历程,我们也多多少少可以看见一些近代思潮演变的痕迹。

称之为“心路历程”,不是随便的譬喻,因为我在这里所谓的思想,不仅是指观念层次上的意识,同时也是指情感层次上的意识,它包括内心生活的各面,只有综合内心生活的各面,我们才能看到谭嗣同的精神全貌,他的心灵世界。

大约而言,思想史有两种,一种是观念发展式的思想(history of ideas)。这种思想史的着眼点是观念的历史发展,它的主要目的是看观念如何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从而分析这些观念间的衍生与逻辑关系,探讨这些观念与其他观念之间所产生的紧张性和激荡性。西方史家鲁佛觉(Arthur Lovejoy)的《存在的链锁》(*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和莱根(Anders Nygren)论“爱”这一观念在西方传统里

的演变 (*Agape and Eros*) 都是这一类思想史的典范之作。^① 用这种思想史来处理哲学史或思想史上的重要观念有其特殊的价值,但是作者在这本书里不拟采取这种方法,因为谭嗣同不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他的思想本身,抽离地或者孤立地去看,没有什么重要的价值。因此,我所采取的是另一种治思想史的途径,那就是把他的思想放在他的时代脉络里去看,看他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刺激和生命的感受,如何在思想上作自觉的反应。只有这样来处理,谭嗣同的思想的历史意义才能彰显。

谭嗣同生长的时代是十九世纪的最后四十年,他的思想由成熟到发挥影响的时期也正是中国文化在近代进入一个转型的时代(1895—1911)。^② 在这转型过程中,谭嗣同的思想扮演了一个极重要的角色。然而由于他的思想的特殊性,要替他在当时的思想界做一个定位并非易事。首先,当时思想界的重大论争,他几乎都未曾直接参与。当时辩论激烈的今古文之争,谭嗣同并未真正卷入。梁启超与康有为本人人都强调谭嗣同受康有为之今文学的影响。^③ 事实上,康梁的这种强调都嫌夸大。谭嗣同受康有为之影响甚晚,直至死前的两三年他才与康有为的思想有所接触,而其时他的思想的基本形态已大致形成。故当时康有为的今文学虽然在谭嗣同的思想里留下一些痕迹,这些痕迹却

① 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Anders Nygren, *Agape and Eros*, (Harper and Row, 1969).

②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Hao Chang, *Liang Ch' i-ch' 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Hao Chang, "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1890-1898",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2, *Late Ching: 1800-1911*, pt. 2, ed. by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74-338.

③ 见梁启超《仁学序》及《谭嗣同传》,收于《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1954版),关于康有为自认对谭之影响,见康著《六哀诗》,此诗也收入《谭嗣同全集》,527页。

与他的基本思想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此外,清季的另一思想论战——革命与改革之争^①,谭嗣同也未介入。这固然是由于这个论战主要爆发在谭嗣同戊戌死难之后,但更重要的是,他晚年虽参加康梁变法,他的思想实兼有当时所了解的革命与改革两种成分,假若他未死于戊戌之难,他后来的思想演变究竟属于改革型还是革命型,实在很难说。

以当时思想界的重大论争去给谭嗣同“定位”固然不易,以今天史学家对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些流行的观念去了解他的心态也颇有隔靴搔痒之虞。“民族主义”这个常用的观念就是一个例子。不错,民族主义之变为近代中国的一个主要思潮,是始于清季转型时期,但值得注意的是:谭嗣同思想虽含有一些国家观念与种族意识,这些观念和意识对他的中心思想却影响不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称谭嗣同思想为“世界主义”^②,实在是有所见而发的。

除“民族主义”之外,中外学者有时以“现代化”这个观念去分析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趋势,但所谓“现代化”是现代学者所用之范畴,是否可以适用于清季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很成问题。大致而言,“现代化”这一观念有广狭二义:就其狭义而言,“现代化”与一般所谓的“经济发展”不分。就其广义而言,则指社会学家以韦伯(Max Weber)的“功效理性”为基础而建立的“理性化”这一发展过程。重要的是,不论是狭义或广义,“现代化”都不是以“道德取向”为主的概念,而谭嗣同的思想却含有极浓厚的道德色彩,因此,在诠释谭嗣同的思想时,我

^① 关于此论争,见斥冰峰:《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台北,1964);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1964);英文有关著作,参见 Mary B. Rankin,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 1902-1911*, (Cambridge, Mass., 1971) 及 Michael Gasster,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Radicalism*, (Seattle, 1969); 日文方面有关著作,参阅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京都,1960)第七章:《章炳麟排满思想》,398-480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台北,1963)。

们很难乞助于“现代化”这一范畴。^①

此外,已故美国学者李文孙(Joseph Levenson)在其所著《中国儒家文化与其命运》一书中,曾特别强调“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这一观念,并以此去分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心态。^②李文孙此处所谓之“文化认同”乃指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与震荡之下,由挫折感与屈辱感所产生的文化自卑心理。李文孙认为,由于这种自卑感的作祟,中国知识分子,自晚清以来,往往有美化传统的心理需要。^③从这个观点去看,谭嗣同早年思想容或含有这种心理因素。但其晚年成熟之思想则难以用此种心理解释去概括。由上面的分析可见:现代史家所习用的一些观点与范畴,我们都不能借以窥谭嗣同思想的全貌。

因此,今天我们要了解谭嗣同之思想特色,必须跳出既有的一些观点的窠臼。我们必须认识,谭嗣同一生,因为兴趣和活动极为广泛,思想难免相当驳杂,但是我们若仔细分析他一生的著作和行迹,亦不难发现他的思想有其脉络可寻,尤其是在他的晚年,他的思想透露一种特殊的心态,这种心态充分反映在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两件大事:戊戌死难时他所表现的烈士精神和他在死难前两年所写的一本书——《仁学》。要了解这种心态和产生这种心态的思想背景,我们必须先对他个人的性格、身世和环境作一番分析。

① 关于“现代化”这一观念的讨论,西方论著甚多,其于诠释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适用性,可参见:Hao Ch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8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2-3.; Benjamin Schwartz, "The Limits of Traditions Versus Modernity as Categories of Explanation: The Cas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Daedalus*, Spring, 1972. pp. 71-88.

②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1958), "Introduction", pp. xiii-xix.

③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1958), "Introduction", pp. xiii-xix.

二、性格、身世与环境

谭嗣同从小就展现出他的性格中最大特色：丰富的情感与豪迈的气质。这种“浪漫型”的性格，在他早年生命的两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第一是他的诗词。谭嗣同从少年时就开始写诗词，许多作品极富感性，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与才华。例如他在十五岁时为送别他的仲兄赴甘肃省父，写了一首七绝：

一曲阳关意外声，青枫浦口送兄行。频将双泪溪边洒，
流到长江载远征。

碧山深处小桥东，兄自西驰我未同。羨煞洞庭连汉水，
布帆斜挂落花风。

萧萧连夜雨声多，一曲骊驹唤奈何。我愿将身化明月，
照君车马度关河。

鹧鸪声里路迢迢，匹马春风过灞桥。灞上垂杨牵客思，也
应回首故乡遥。

春烟澹澹黯离愁，雨后山光冷似秋，楚树边云四千里，梦
魂飞不到秦州。^①

谭嗣同的感情不但发为浓厚的手足之爱，而且也时而表现为强烈

^① 见《谭嗣同全集》，487页。

的社会同情心和正义感。他在旅行时,偶尔见到一些悲惨的或者不平的事件,便会触发他的情感,反映在他的诗篇里。例如,他在二十四岁出外旅行时,曾写下《儿缆船并叙》这样一篇诗章:

友人泛舟衡阳,遇风,舟濒覆,船上儿甫十龄,曳舟入港,
风引舟退,连曳儿仆,儿啼号不释缆,卒曳入港,儿两掌骨见焉。北风蓬蓬,大浪雷吼,小儿曳缆逆风走,惶惶船中人,生死在儿手。缆倒曳儿儿屡仆,持缆愈力缆靡肉,儿肉附缆去,儿掌惟见骨。掌见骨,儿莫哭,儿掌有白骨,江心无白骨。

同年,他又写了下列两首小诗:

《罌粟米囊谣》

罌无粟,囊无米,室如县磬饥欲死,饥欲死,且莫理,米囊
可疗饥,罌粟裁千里,非米非粟,苍生病矣。

《六盘山转饷谣》

马足蹙,车轴折,人蹉跌,山岌岌,朔雁一声天雨雪。與
夫與夫,尔勿嗔官! 仅用尔力,尔胡不肯竭? 尔不思车中累累
累物,东南万户之膏血,呜呼车中累累物,东南万户之膏血!①

短短的几行,淡淡的几句,这些小诗却道尽了他对社会大众的关怀和同情!

至于他性格中豪迈超逸的一面,谭嗣同在他十八岁时,为自题小

① 《谭嗣同全集》,上引三首小诗各见 461,462,463 页。

照所写的一首《望海潮》词里,曾有清楚的流露:

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骨相空谈,肠轮自转,回头十八年过;春梦醒来波:对春帆细雨,独自吟哦;惟有瓶花数枝,相伴不须多;寒江才脱渔蓑;剩风尘面貌,自看如何;鉴不因入,形还向影,岂缘酒后颜酡;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①

“诗如其人”这句话,就谭嗣同而言,是再恰当不过了。谭嗣同在这首词中自称“有几根侠骨”,而他的一生行迹也确实常常显出侠气纵横。这是他生命中的另一突出面,据梁启超说,谭嗣同年轻时“好任侠,善剑术”,当他父亲在甘肃服官时,他常常出入西北边塞,骑马射箭,奔逐驰骋。② 这种任侠的倾向,正如同他丰富的感情,是他性格中与生俱来的,对于他的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

要了解谭嗣同的思想,他的主观性格和禀赋固然重要,客观环境也同样不容忽视。与许多人一样,谭嗣同的思想大部分来自他对所处环境所作的回应。所谓环境是指三个因素。首先是他的社会背景,特别是他的家世。这个因素对他的影响至少有三方面。他出身仕宦之家,因此受到极良好的传统教育。父亲的游宦,加上他本人南北奔走应试,使他有許多旅行游览的机会。谭嗣同在《三十自纪》一文中,对自己的旅行之广,特别引以为傲,他曾计算他的旅行“合数都八万余里,引而长之,堪绕地球一周”③。这些旅行自然增广了他的交友与见识,开阔了他的眼界,例如他在二十六岁时,曾随他的父亲赴湖北巡抚

① 《谭嗣同全集》,277页。

② 《谭嗣同全集·刘云田传》,170-172页;《致刘崧芙书》,376页;《与沈小沂书》,431页。

③ 《谭嗣同全集·三十自纪》,205-206页。

任所——武昌。武昌也是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驻节所在，张的幕府中人才济济，如汪康年、缪荃荪、徐建寅与黄绍箕等，都是当时有学问、有新思想的士大夫。谭嗣同在武昌有机会与他们结识来往，对他的眼界和学识自然极有增益。^①

谭嗣同的家世不但给他一个良好的学识环境，也给他带来很多问题和困扰，对他的精神产生相当的刺激。他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官僚，有妻有妾。谭嗣同是嫡出，但母亲死得很早，在家里很受庶母的歧视，和父亲的感情也有隔阂。谭嗣同后来在其《仁学·自叙》里曾提及他的家庭：“吾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忍受，濒死累矣。”^②可见家庭给他带来的痛苦。

要了解环境如何影响了谭嗣同的思想，我们不能只注意他的家世背景，我们也得注意他一生中的各种处境。所谓“处境”是指个人生命过程中所自觉其重要性的一些事实或情况。就了解谭嗣同这种知识分子的思想而言，有两种处境特别值得重视。一种是所谓“生命的处境”。这种处境是指生命中不可避免的一些情况和遭遇，例如死亡、恋爱、疾病、衰老和个人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逆境和重大变迁。

另一种可称之为“历史的处境”。这种处境是指国家社会所经历的重大变迁。谭嗣同生长于十九世纪的最后四十年，正是中国文化思想开始巨变的时代。外力的震荡已由文化的边缘渐渐波及文化的中心。这种巨变，大约而言有两个方面。首先是传统宇宙观的动摇。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传统儒家的宇宙观，因为它是当时一般士大夫主要信仰之所在。这种儒家宇宙观的核心当然是“天人之际”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天人之际的思想在传统儒家是由一些形而上学概念如阴阳、气化、五行、四时、天、道、性、命等构成的。^③ 对于这些观念和天

① 杨廷幅，《谭嗣同年谱》（北京，1957），57-58页。

② 《谭嗣同全集·仁学·自叙》，3页。

③ 关于此问题的详细讨论，见前引拙著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PP. 5-8.

人之际的思想来说,十九世纪末叶输入的西学,特别是当时的科学宇宙观和基督教创世观,当然都是一种挑战。1895 年左右,四川的一位士大夫——宋育仁写了一本书叫《采风记》,就把这种挑战说得很清楚:“其(指西学)用心尤在破中国祖先之言,为以彼教易名教之助,天为无物,地与诸星同为地球,俱由吸力相引,由天尊地卑之说为诬,肇造天地之主可信,乾坤不成,两大阴阳,无分贵贱,日月星不为三光,五星不配五行,七曜拟于不伦,不祀诬而无理,六经皆虚言,圣人为妄作。据此为本,则人身无上下,推之则家无上下,国无上下,从发源处决去天尊地卑,则一切平等,男女均有自主之权,妇不统于夫,子不制于父,族性无别,人伦无处立根,举宪天法地,顺阴阳,陈五行诸大义,一扫而空。……夫人受中天地,稟秀五行,其降曰命,人与天息息相通,天垂象见吉凶,傲人改过迁善,故谈天之学,以推天象,知人事为考验,以畏天命修人事为根本,以阴阳消长,五行胜建皇极,敬五事为作用,如彼学所云,则一部《周易》全无是处,洪范五行,春秋灾异,皆成瞽说,中国所谓圣人者,亦无知妄人耳,学术日微,为异端所劫,学者以耳为心,视为无关要义,从而雷同附和,人欲塞其源,而我为操器,可不重思之乎?”^①

宋育仁的这段话透露了一个重要的消息:西学和西教的流入不仅威胁着传统的宇宙观,而且因为传统的宇宙观与价值观是互相依存、无法分开的,对传统宇宙观的挑战也就是对传统价值观的挑战。我们由此看到十九世纪末叶思想变迁的另一面:中国传统价值秩序开始解纽。^② 要了解这种解纽形势的出现,在考虑西方科技与西教的输入之

^① 宋育仁,《采风记·记三》,8-9 页;《记四》,34-35 页。

^② 关于此问题的详细讨论,见前引拙著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pp. 4-8. 及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hin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此文为作者在新加坡召开之 Conference on Confucian Ethic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Industrial East Asian (Jan. 5-9, 1987) 所提出论文,尚未发表。

外,我们尚需注意帝国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所造成的刺激。在这种刺激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在 1860 年到 1900 年这段时间里渐渐认识到:中国之受外强欺压不仅是因为科技的落后,而且也因为制度的不臧。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 1895 年甲午战争以后,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已开始觉察到:对于传统制度的批判,不能只限于枝叶,必须深入到它的根本。而因为传统制度的基础是建筑在以三纲思想为中心的价值观上,对于传统制度的批判终于演变为对传统政治和社会价值中心观念的怀疑和挑战。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传统的帝制思想。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眼里,帝制不但无法应付中国所面临的政治危机,而且也失去了道德的威信。总之,不论从现实的功效角度或者道德价值的角度,帝制均不足以充当政治社会秩序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问题很自然地浮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里:传统秩序的思想基础既然动摇,如何重建一个新的秩序?这也就是“群”这个问题为何在甲午以后变成当时知识分子所关心的焦点。^①

传统宇宙观和价值秩序的动摇,象征着近代中国思想危机的序幕。这就是当时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历史处境的重要特征,以谭嗣同的禀赋、学识和眼界,他当然要比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对这种历史处境来得更为敏感。因此,历史处境和谭嗣同个人的生命处境一样,是影响谭嗣同的思想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面我简略地讨论了家世背景和处境对谭嗣同思想形成的重要性。但是影响谭嗣同思想的环境尚有另一面,那就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思潮与学风。

谭嗣同出身士大夫阶层,是当时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自然对他的时代的思潮与学风有强烈的感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因素一方面

^① 关于此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拙著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pp. 95-112.

可以像社会背景一样造成一种文化氛围,使人浸沉于其中,受其潜移默化。另一方面,它们的影响往往是透过对处境的自觉而造成的,一个人面对各种生命和历史的处境,自然发生问题,产生困惑和焦虑,从而希望能在他的时代的思想和学术潮流中寻求解答。

前面说过,谭嗣同一生游历极广,思想接触面极大。因此,要了解他所受的思想影响,我们需要对晚清的思想界作一全面的鸟瞰。

谭嗣同生长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这个时期正是西学由沿海通商口岸渐渐渗入内陆城市,形成晚清学术界的一个日益重要的新潮流。^①同时西学不但流布日广,而且西学的内容也日形丰富,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学的兴趣已不仅限于“船坚炮利、声光化电”,在所谓的工艺之学之外,他们发现西学尚有“政”和“教”两方面值得重视。^②

晚清思想的演变不仅是对西学冲击的回应,我们必须同时正视传统对当时思想的影响,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谭嗣同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接触西学时,大多已接近成年,在此之前,由于旧式教育的影响,传统已在他们的人格和思想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

其次,他们成年以后的思想发展也仍然与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大约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这些关系。首先,对于知识分子的情绪而言,传统思想有其吸引力,李文孙所提出的文化认同观念在这方面是不无洞见的,诚如他指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基于西方冲击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在情感上常常需要借着肯定传统而得到弥补。^③我们毋庸讳言,这种心理需要,就许多知识分子而言,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的。问题在于,李文孙认为承认某种思想在情绪上有吸引力并不意味着其有理性上的说服力。照他看来,晚清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肯定只是情绪依恋的反映,心理自卑感的作祟,因此传统在思想上其实并没有实

① 见拙著 *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pp. 276-277.

② 见拙著 *Liang Ch' 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pp. 92-95.

③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pp. xiii-xix.

质性的影响。^① 李文孙在这里所忽略的是动机与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不错,一位知识分子研究某一思想的原始动机很可能与那思想的内容并无真正的关系,但不可忽略的是,一旦他进入了那思想的领域以后,那思想就可能凭借其自主性和理性的说服力,转而改变其原来的动机。动机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发展过程,在过程中,它可以转向和变质。同理,晚清知识分子对传统思想的某些方面开始发生兴趣时,可能是基于心理上的一种需要,如文化自卑感、挫折感等,但是当他们对那些思想作了深入研究以后,思想本身就可能产生影响力,从而改变他们原来的研究动机。

李文孙的错误是只见到传统的文化观念在情绪上的吸引力,而不见其在理性上的吸引力。这里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传统思想有重要的一部分是针对一些人类高级文化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而发的,如人性的问题、生命的目的和意义、道德与政治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等。传统文化环绕这些问题,历代都有反省和讨论,造成一个绵延不断的思想传承。这个思想传承,不似道德规律和宗教信条那么容易僵化,因为它的根源是人类社会所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只要这些问题存在一天,这个传承就会继续有它的吸引力。晚清知识分子在这一个传承的影响之下,自然与传统在思想上有其呼吸相通之处。我们由此也更可看清传统在思想上如何发挥影响。

传统思想对晚清文化范围的重要性,既如上述,此处拟从三方面对当时的传统学风与思潮作一简要的勾画。

一、儒家思想:谭嗣同是浏阳人,浏阳当地的学风对他当然不无影响。他在三十岁前后所写的札记中,曾经透露,浏阳的思想界在十九世纪晚期仍有朱学与王学之分。^② 我们现在虽无从考知谭嗣同在当时

^①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pp. xiii-xix.

^② 《谭嗣同全集·石菊影庐笔识》,270-271页。